

建国以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述要

谭献民¹, 王 军²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建国以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弥久常新的问题, 也经历过长期和曲折的历史过程。但是, 至今仍然没有一篇完整的阐释知识分子研究的综述类文章。笔者不揣简陋, 立足所能收集的参考资料而作一综述。

关键词: 建国以来; 知识分子问题; 研究述要

中图分类号: D6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 (2010) 03-0103-10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1], 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 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 而知识分子是文化工作者的主体, 从而也掀起了人们对知识分子新一轮的关注, 但在研究中笔者发现, 迄今尚无一篇完整的阐释知识分子研究的综述类文章, 为长远研究计, 笔者不揣简陋, 立足所能收集的参考资料而作一综述。

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历史过程

建国以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 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为起步阶段。

建国初期, 即开始探索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在毛泽东的“思想改造, 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口号的引导下, 社会各界学者纷纷展开学术研究

和发表评论文章, 探索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一化三改”的关系, 它贯穿于整个过渡时期。

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 沈志远撰《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展望周刊社1952版)、钱俊瑞等编《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泥土社1951版)、汪小川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东北人民出版社1952版)、中国民主同盟总宣传委员会编《论知识分子》(北京新华印刷厂分厂1952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编辑《论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1953版)、杨奎章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共中央华东局统一战线工作部1954版)、中原大学政治学院辑《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中原大学政治学院1950版)、郭沫若著《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出版社1956版)、黄磷著《做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版); 而且也积极翻译了一些国外作品, (苏) 普洛茨科著高峰译《苏联的知识分子》(上海出版公司1952版)、慧文辑译《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教育》(平明出版社1952版)、(苏) 普洛茨科撰、晨曦译《为共产主义而

收稿日期: 2010-06-25

作者简介: 1. 谭献民(1955-)男, 湖南安仁人,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www.cnki.net>

2. 王 军(1979-)男, 山东临沂人,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博士, 长沙市岳麓区委党校教员。

斗争的苏联知识分子》(中华书局 1950 版)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呈现三个特点:即党的领导方针的正确、知识分子的自觉改造、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极大热情。三者构成一股合力而成为推动“三大改造”顺利完成和知识分子地位被承认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从 1949 年至 1957 年春,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积极性最高涨的时期之一。他们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完成‘三大改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4]

2、第二阶段:从 1957 年初到 1976 年为徘徊阶段。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展,使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提出著名的“双百方针”,为知识分子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事业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影响下,1957 年 3 月,毛泽东批示:“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5]又使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开始转向阶级分析的框架。

分析和研究似乎又回到历史的起点:即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几乎所有的论著都是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如刘震的《谈谈知识分子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杨源时著《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谈知识分子的改造》(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版)、《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 年版)、方用的《在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上驳斥右派》(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孙叔平的《知识分子必须红透专深》(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光明日报社编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民主党派自我改造大跃进学习参考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 1958 年版)、奚虎一著《知识分子改造的基本途径》(贵州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插红旗、拔白

旗、上海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检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陈静波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关键——立场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张劲夫著《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刘寿祺编著《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等。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反映知识分子的其他一些问题,而且也有承认知识分子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性质和思想改造,已经成为“左”倾错误的理论依据之一,致使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处于挫折和徘徊状态。

3、第三阶段:从 1977 年到 1989 年为思想解放和有所失误的阶段。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实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它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科学结论^[6],使对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开始复苏。如 1977 年初,晨歌的《不许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判“四人帮”围剿〈园丁之歌〉的罪行》,范景方的《必须正确分析和估计我国知识分子现状——彻底批判“四人帮”歪曲、反对毛主席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科学分析》分别在《思想战线》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其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天津教育、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分别发表了阐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文章,开启了知识分子研究之思想解放的先声。

纵观这段时期的研究,大致分为五类:其一,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总结和反思。如李蔚编著的《周恩来和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 1985 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3 版)、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的《知识分子问题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版)、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编的《论知识和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版)等。其二,对知

知识分子的地位、性质、作用的研究。如刘洪侠、刘贵田主编《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版）、吴廷嘉著《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1987版），该书再现了生活在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周方良主编《知识分子经济政策研究——困境与出路》（春秋出版社1989版）、胡祥明、张敏主编《知识分子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版）、于维栋著《知识分子与现代化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版）、阮波等主编《新时代智慧之歌——知识分子的颂歌》（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版）、黄丽华著《最后一个浪漫诗人的困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及其转型》（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8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局编《理想的脚印——记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优秀知识分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版）、陈祖芬著《飘走的蒲公英——现代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华夏出版社1989版），该书的主人公均为叱咤风云的改革家或奋力拼搏的知识分子。其三，重新认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如（澳）L.G.丘奇沃德著，石宜译的《苏联的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1978版）、（苏）费久金、埃利达罗娃编，张鼎芬译的《列宁和党论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版）等。其四，参考西方学者的论述，强调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责任意识：如（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指出“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美）张灏著，高力克等译《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秩序与意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版）；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版）等。其五，对知识分子健康的关心。一批有影响的关注知识分子健康的著作相继问世，如翟凤英《中年知识分子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卫生研究》1984年4期）、秦正誉《肥胖症对中老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的影响》（《体育科学》

1985年1期）、许士凯编《中年知识分子养生指南》（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88版）等。

这一时期是知识分子研究最繁荣的阶段之一。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展开，我国知识分子在审视现实的同时，也必然会对自身和现实和传统的理论重新予以思考。实事求是的讲，这是新时期知识分子自我认知的体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苏东剧变）以及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依据从传统转向现代等（亦即思维方式的转型），特别是西方和平演变思想的冲击，致使知识分子的研究逐渐失去正确的方向，而在1989年的学潮中达到顶峰。“这就难以使他们对理论与现实做出全面的、历史的客观性观察与思考，部分人犯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动摇怀疑，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误入歧途”。^[7]

4、第四阶段：从1990年至今为历史反思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的学生骚乱及其苏东剧变的影响，使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走向历史的反思。“经过了‘六四’风波，又经过了国际、国内那段时间的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震荡，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里面，在知识分子圈中，1980年代的那种乐观和自信迅速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8]“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在痛苦中重新思考。他们不仅审视昨天热衷的西方理论与学说，也批判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9]于是一批反思性的文章和著作相继出版，如1991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张维庆主编的《信念与使命——和青年知识分子谈谈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怎样“富”起来的、怎样看待东欧政局的变化等问题，系统的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同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通过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蹒跚步履、未及整合的灵魂撕裂、在百年震荡的文化断谷的论述，探索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中，还包括林则茂主编《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版）、李

良玉著《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版）、李国强等主编《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江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 1991 版）等著作。这些反思性的研究，在帮助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走出那段思想困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痛苦的反思中，重新发现了毛泽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学校园里的一股股‘毛泽东热’就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选择的开始。这是一种真正的理性思考与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的回归。”^[10]

进入 2000 年以来，国内知识分子研究走向新的历史高度。这主要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研究的深入和对其规律的把握上：

其一，注重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和精神需求的研究。如饶定轲等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版）中系统总结了建国 50 年来知识分子工作发展的历程及经验教训，并探讨了当代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大作用、以及研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变化发展趋势及其主客观原因。钟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与中国知识分子》（巴蜀书社 2002 版）中阐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应有的精神状态、应得到的价值承认、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现实问题。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版）中从“知识分子死亡了吗”、“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等问题入手，既有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也有对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力作之一。赵宝煦主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 2003 版）对中国知识分子在当前和未来的国家与社会发展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入手，并对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存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局限性等做了评估。

其二，注意微观问题和专业问题的研究。如刘国军在《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变革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版）中记述并分析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变革观、李

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关系、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工业化的探索、邓小平社会发展及对外开放的思想等，让读者全面认识知识分子。张红的《抗战中的内迁知识分子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版）通过研究内迁西南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时期不断走向成熟的历程，突出了在内迁中进步知识分子保存中国文化血脉、开发西南的贡献。丁俊萍等主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华文出版社 2006 版）从不同侧面系统地总结了党外知识分子之统战工作的特点、规律和经验，尤其是阐述了党外知识分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

其三，强调全球化视角下知识分子的特殊性研究。2001 陈祖芬的《中国牌知识分子》通过“祖国高于一切”、“中国牌知识分子”、“活力”、“最佳年龄”、“心灵”等文章阐释了中国特色知识分子的“特殊性”。2005 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刘晓明主编的《优化人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追溯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比较了外国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向世人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2007 年张波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在中央文献出版，这是一本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形势变化和发展为背景，分析说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这种变化发展中无法逃避的现实选择状况，并对未来知识分子作了乐观的展望，是一部现状与时代背景结合的佳作。

随着知识分子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也举行了一些的研讨会：1997 年 11 月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举办的“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召开；2002 年 1 月“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2002 年 12 月《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 年 12 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武汉大学等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以“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2006 年 6 月“东亚历史中的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近二十位世界著名大学学者出席；2006 年 12 月“传统与现代语境下

的知识分子”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2007年10月，“性别平等，知识分子的作用”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以及2007年11月“知识分子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为主题的中国现代史学会年会在江城武汉理工大学举行等，这些研讨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的研究。

二、关于知识分子属性、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性质、地位及其作用的研究，既是基础性的，也是主导性的问题，贯穿于研究的始终。从李大钊、张东荪、瞿秋白、鲁迅等的“知识阶级与劳工关系”、“知识阶级的历史作用”，到胡适、费孝通“知识阶级”，再到建国后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使命”、“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等等，都是以此来展开的。

1、知识分子的界定：建国以后，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赵宝熙认为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知识分子是指“具有比较专门的系统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而狭义知识分子是指“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人，即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11]；王增进则从三个词“智力”、“兴趣”和“创新”来界定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是“智力水平较高、对自然或社会问题怀有一贯而浓厚的探索兴趣并有所创新的人”^[12]；邵建则认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职业，即“以知识为业”，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社会事务有所担当”，即“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职业与志业。前者是为了谋生，后者则是为了信念^[13]。王卫平认为：“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有学历且从事脑力劳动者多矣，‘知识分子’在无形中被泛化了。这使我们面临这样的尴尬：究竟谁不是知识分子。”并指出“知识分子往往是时代的精英、社会的精华、启蒙的力量、思想的先驱，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负载者”^[14]。俞可平认为“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创

造和传播价值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15]。还有许多学者从非权力角度进行阐述知识分子，如许纪霖指出“从事知识创新和思想探索、具有个体自主的精神权威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的群体或个人”^[16]；杨继绳则指出“知识分子是没有掌握行政权力和资本支配权力，专门从事知识创新、文化产品创造和知识文化传播的一族”^[17]。

2、知识分子的阶级定性：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这是由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阶级理论所引起的，也是知识分子研究中的一个政治和学术容易混淆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理论界并没有就此止步，而且角度和内涵又发生了变化。如孙继虎指出“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独立的阶级，只能依附一定的阶级……毛泽东晚年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失误，并成了他后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关键因素。”^[18]吕小蓿通过对刘少奇知识分子思想形成的过程研究，指出“刘少奇不仅是将职员、教员列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且将脑力劳动者都列为工人阶级范畴”所以“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阐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领导人。”^[19]孟庆俊则强调“周恩来同志第一个提出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的观点。早在1925年6月，他就指出，‘知识阶级’的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说是知识分子或知识界。”孟又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党内最懂也是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大知识分子最为爱戴的伟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知识分子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光辉思想，成为党的重要理论财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思想。”^[20]王杰指出陈云是最早赋予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属性的共产党人，“史料至少说明，在刘少奇之前的中共其他领导人，已就此做过‘全面和深入’的探讨。”^[21]石国亮指出“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只能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因此，正确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成了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关键。每当科

学的判定占主导地位时,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会出台,而每当错误的判定占主导地位时,知识分子政策便会出现失误。”^[22]莫岳云则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出发,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标准、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经济来源进行研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再探讨^[23],强调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程新英则认为“随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一系列极为深刻的社会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阶层结构、社会作用较之传统社会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4]。

3、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都将一事无成”。^[25]从20世纪末至今,关于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陈吉德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地位由传统的‘士农工商’顺序中第一位变为‘工农兵学商’顺序中的第四位。”而“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丧失直接导致了银幕上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到了“文革”期间,八亿人民八台戏,八台戏中就不可能有知识分子的踪迹。”^[26]袁张帆认为“‘三个代表’在知识经济大背景下提出,它对我们作为当代第一劳动力的知识分子有着尤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为我们个人能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是“‘人的现代化’中的中坚力量。”庞翠华认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成为主流发展趋势的国际化背景下,中国已经适应潮流,实施了科教兴国的治国策略,这使得知识分子将要承担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责任。”韦庆儿认为“以史为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任重而道远,既要尽快培养第一流的科技专家,又需要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不断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理论水平,努力建设一支跨世纪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队伍,广泛团结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港澳台海外侨胞中的知识分子,争取和引进外国专家为经济和科技发展服务。”^[27]席富群认为“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它肩负着继承、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特殊使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智慧和良心,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运动趋势总是与先进阶级相

联系,在历史转折时期,总是为社会的变改摇旗呐喊,为先进阶级制造舆论、创造理论、造就思想家与革命领袖”。杨生博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一是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动力承载者;二是民族未来灵魂的塑造者;三是人类走向统一的联系者。”所以,“必须尊重知识,尊重并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28]但是潘少云、高文武则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从来都是有限的,其有效发挥也是有条件的。在当今中国,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除了知识分子要认清自身的社会责任,端正自己的价值取向之外,党和国家也要进一步为知识分子展现才华、服务社会、全面实现自身的价值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29]梅荣政、周志平也指出: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欲掌握“话语霸权”、成为独立的“意见领袖”的“最热切希望”是难以实现的。^[30]

三、关于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的研究

知识分子与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上,且集中体现在研究和探讨建国初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总结经验而探索规律。杨凤城在《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就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指出了关于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党内认识存在着两重性。即“正是在1956年周恩来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毛泽东却在很多场合频繁地提出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属于资产阶级的问題,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使党内在该问题上出现或形成了明显的两重性认识或矛盾认识。”^[31]石国亮指出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定的两重性标准,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曲折发展的直接原因。“建国头17年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之所以出现正确与失误并存发展趋向,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始终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从经济地位上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32]所以,

“党在上述问题上的曲折发展，决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曲折发展。”^[33] 谢玉霖指出：十年建设时期，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之所以走过一段弯路，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安邦治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的关键在于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和决策的随意性。因为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但他往往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在没有经过中央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轻易改变中央的结论。^[34] 夏杏珍也指出“毛泽东一方面主张艺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补充、发挥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理论的正确的方面；但同时又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来概括和观察一切学术问题，强调上层建筑领域内两个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后一个方面的过分强调，成为后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左’的做法的理论根源。”^[35]

当然也有人从其他的角度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如王泽东从党外知识分子角度阐释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认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党外知识分子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在思想上对党外知识分子以诚相待，广交知心朋友；在政治上时刻关心党外知识分子，多加帮助；在工作中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在生活上照顾党外知识分子，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出更大贡献。”^[36] 周秋光认为“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理论依据有二：一是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统一战线，但其实际内涵却与当年马克思等人所论述的“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不是一回事。二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存在统一战线。所以“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对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由统战部具体运作实施，还是因为考虑到党外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党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所采取的一项举措。”^[37] 吴晓敏则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轨

迹：从萌动到提出；从比较正确到发生偏差、乃至严重失误；继而又拨乱反正，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程，指出：“考察党对知识分子有关政策产生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历来是很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虽然在80多年历史中，中共知识分子政策时有因总的指导思想失误而发生偏差，但最终都靠中共自身力量拨乱反正，回到正确轨道的。随着中共党自身建设的加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共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深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也将更具体，更有利于全面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38] 吴小妮则从人性角度研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要维护与开发意识形态资源来构建执政的合法性，自然离不开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的特质又使党对其充满了戒备和不信任。这种戒备和不信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在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而接连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得到强化。革命胜利后，在新的阶级关系格局中，工人、农民成为新政权的基础、支柱；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被剥夺、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通过赎买政策被抽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然后加以思想改造；只有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无法剥夺的。^[39] 这种知识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新社会的文化资源又是旧秩序的精神遗产，这就使他们成为新社会中既不可缺少却又具有潜在威胁的一种社会力量。在执政党看来，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来自国统区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但是受旧社会的影响深，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比较陌生和疑虑，有些向往的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建设又离不开他们，这不能不构成对新生政权的潜在威胁。^[40]

四、关于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运动的研究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原子，必然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分不开。所有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当然也是研

究的重点。

1、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

曾长秋通过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几个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阐述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青年》派”。他们“与前两个知识群体不同,这些人怀抱爱国热忱和远大理想,在实践中选择西方的各种学说,把文化重建和社会改造密切结合,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来建立‘第三新文明’,并努力使思想启蒙走向工农,成为救国救民的理论。”^[41]徐木兴通过对浙江籍知识分子突出贡献的研究后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以其独特个性涉足思想、文化、教育、艺术等几乎所有领域,且建功甚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构素之一。”^[42]他还论证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主体是一群异于戊戌和辛亥知识分子群体的,即更具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读过四书五经,但基本上是在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洋务学堂中得到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他们是开创中国新知识转型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43]元青认为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44]并且“他既批评文化保守论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荒唐可笑;也批评全盘欧美化论者‘沉醉西风’、‘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45]许全兴通过对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认为,其存在着简单否定的思维方式,即“强调的是思想文化的时代性、阶级性,忽视了它的民族性、继承性”,最后指出“只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忽视对它的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弘扬,是新文化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存在的倾向。”^[46]武吉庆认为“知命主义”是一道禁锢国人精神世界的枷锁,以至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生活日趋贫乏,价值渐次失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有力的改变了这种现状,使“一切价值来源于创造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最后

得出“人生价值的高低,并非取决于个人年寿的长短,而是取决于他的勤勉程度。所以,人们应该在有生之年,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获得更多的价值。”^[47]

2、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程光炜认为五四知识分子的首选从事传播新思想的报刊编辑,指出他们优先考虑的人生目标不是生存,而是救亡图存的事业,“在这里,‘五四’知识分子开始从‘读书求仕’的传统知识分子道路上分离出来,而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48]

房成祥指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群已经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起了桥梁作用,还是建党的骨干力量,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49]赵晖认为在整个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是新思想的传播者,他们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沿阵地,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陈季君认为“五四运动中,使中国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认识到了中国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出路,因而迅速地实现了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登上了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舞台,实现了新的觉醒。”^[50]刘家志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有广大民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一次扬弃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运动,是一次广泛提倡民主和科学的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在这次运动中,知识分子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而且一直是这次运动的主力军。^[51]叶青在研究了五四运动前夕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认为严重的危机的国情,催促着五四前夕知识分子去撷取各方面的精神食粮,导致百说杂陈、百家争鸣的大潮,但并没有仔细甄别的时间和环境,“他们饥不择食积极寻找各种理论武器。西方所有思想观点都可以在五四前夕中国知识分子中找到它的学生,享有广泛同情和拥护的厚遇。”所以,五四前夕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的认识较模糊。炎冰认为,从五四运动的全程来看,无论是运动初期或是发展阶段,无论是游行示威或是交涉谈判,无论是发表演

说、散发传单或是设刊论坛,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无不身体力行,首当其冲,率先走在队伍的前列。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既有其历史价值,也有其现实意义。^[52]

五、知识分子研究的几个问题

知识分子研究有待进一步广泛而深入地展开,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之理论命题的提出,更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研究。另外,以往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其褒义的一面,而对其缺陷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如:“学术造假”、“学业造假”“特别是高级职称,评得太滥了”等。正如杨继绳所说:“由于缺乏社会制衡,知识分子职称评定失控,各种人也要分享‘有知识、有学问’的光荣。”^[53]产生这种缺陷的原因是什么?是体制原因?是社会制度原因?抑或是还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内因?它们还会产生什么灾难性的后果等等,这些领域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显然,诸如此类问题,不胜枚举,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予以展开研究。

参考文献:

- [1][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6.
- [3]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A].《毛泽东选集》[C]: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9.
- [4][35] 夏杏珍.1949年至1957年春: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形成[J].党的文献,2007(02):64—70.
- [5] 毛泽东选集[M]:第5卷.409.
- [6] 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9.
- [7][9][10] 郑晔,李晨主编.中国共青团七十年理论探索:纪念中国共青团七十周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65.
- [8] 葛红兵.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M]:第3卷:论争?文类.106.
- [11] 赵宝熙.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48.
- [12] 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5.
- [13] 邵建.关于知识分子的两个问题[J].粤海风,2003(2).
- [14] 王卫平.走出知识分子的神话——40年代与90年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一种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2004(5).
- [15] 俞可平.游魂何处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J].天津社会科学,1996(5):75—78.
- [16] 许纪霖.智者的尊严[M].1991.
- [17][53]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250.
- [18] 孙继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原因[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2):31.
- [19] 吕小蓓.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历史考察[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04):47—51.
- [20] 孟庆俊.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探析[J].理论学刊,2000(02):112.
- [21] 王杰.最早全面深入探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中共领导人——兼与韩亚光先生商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06):94—95.
- [22][32][33] 石国亮.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演变的理论探讨[J].理论探讨,2001(02):81—83.
- [23] 莫岳云.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析疑[J].学术研究,2002(08):86.
- [24] 程新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使命意识的变革[J].道德与文明,2002(02):67—70.
- [25] 席富群.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论[J].史学月刊,1998(5).
- [26] 陈吉德.论中国电影表现知识分子的三次浪潮[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 [27] 韦庆儿.论抗战文化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J].桂海论坛,2006:(4).
- [28] 杨生博.知识分子使命浅析[J].理论导刊,2003(06):42—43.
- [29] 潘少云,高文武.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初探[J].理论月刊,2007(4).
- [30] 梅荣政,周志平.“公共知识分子”论事怎样一种思潮?[J].高校理论战线,2005(2):38—41.
- [31] 杨凤城.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01):71—74.
- [34] 谢玉霖.十年建设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顾[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08):23—26.
- [36] 王泽东.党外知识分子: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J].理论探索,2006(01):121—123.
- [37] 周秋光.论新世纪新阶段党外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工

- 作对象[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1):45—49.
- [38] 吴晓敏.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考察[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77—82.
- [39][40] 吴小妮.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构建[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2):225.
- [41] 曾长秋.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知识群体的中西文化观[J].娄底师专学报,2000(01).
- [42][43] 徐木兴.浙江籍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5):99.
- [44][45] 元青.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J].南开学报,2005(02):44.
- [46] 许全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J].2008(03):26—33.
- [47] 武吉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观探析[J].安徽史学,2008(03):55.
- [48] 程光炜.“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58.
- [49] 房成祥.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群[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3.
- [50] 陈季君.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新觉醒[J].遵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3):11.
- [51] 刘家志.五四运动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分子[J].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05):48.
- [52] 炎冰.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2):11—15.

(责任编辑:肖承罡)

(上接第 102 页)

7、建立党外干部工作人才库,加强人才储备。要重视人才储备,通过建立数量充足的党外干部“人才库”,为党外干部选拔任用提供人才储备。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成员中,物色具有一定代表性、经过基层锻炼、高学历、综合素质高、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党外人士,充实到后备干部队伍中去,并将其纳入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明确规定党外干部在后备干部中所占的比例,并做好物色培养和调整充实工作,使后备干部中党外干部比例逐年提高。

总之,建国以来党外干部工作的完善和发展,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外干部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3—14.
- [2][3] 21世纪领导用人要鉴[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812,813.
- [4][8] 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63,168.
- [5] 人民日报[N],2004-08-26(4).
- [6][7][1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77,680—681,681.
- [8]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4.
-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54.
- [10]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4.
- [11][14] 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707,705—706.
- [12]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96.

(责任编辑:肖承罡)